

中国史学与文化建设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史学与文化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从文化的内涵来说,史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从史书记载和反映历史面貌来看,文化又是史书内容的一部分。史学在文化建设中能够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阐述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发展的特点,揭示历史上各族间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总结历史上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普及历史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等,都大有作为。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必将推进中国史学迈向新的高度,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史学传承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进史学工作者队伍成长、壮大,从而迎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新高度、新境界。

关键词: 中国史学;文化建设;辩证关系;史学工作者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2)04-0001-07

随着我们伟大的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已经到来。在这个新的征程中,史学同文化的关系,史学在文化建设中的独特的重要作用,以及史学如何在文化建设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更好地服务社会,加快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步伐,这是史学工作者应当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也是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就此发表一点粗浅的认识,希望引起更多同仁的关注。

一、史学与文化的辩证关系

史学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同时又是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这是史学与文化的一种特殊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辩证关系。李大钊在论述“什么是历史”时写道“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

社会的变革。”^[1]我们知道,史学是历史的记录和解释,换言之,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视为文化的记录和解释。它们都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就其文本来讲,包含经、史、子、集四大类,而史学是其中之一,史学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为什么说史学又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呢?如上所说,这是因为史学是记录人类历史进程的学问,其中也包含记录人类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进程;如果离开了史学,则文化发展进程的脉络就难以表述清楚,甚至在有些方面就不为后人所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对于文化与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面貌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所谓“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隋书·经籍志》总序)。它们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中国最早的一些学术史,都出于史书的记载。如《史记》有《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

收稿日期:2012-07-05

作者简介:瞿林东(1937-)男,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吕不韦列传》等,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说及其在历史运动中的表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记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这不是按人而是按学术派别写成的学术史;《史记》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这是就儒学的发展作了概括的阐述^[2]。

在《史记》之后,《汉书·艺文志》也是一篇学术史著作,其总序说: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轂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这篇总序简要说明了自春秋末年至西汉末年数百年间学术演变的情况和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成就。该序中所说《七略》著录之书,主要反映了这期间学术发展中的各家学说流传下来的文本,后人据此可知当时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降至唐初,史学家撰《五代史志》(即《隋书》志),其中《经籍志》总序及四部著录之书,也具有这种性质和作用。如果我们对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通览、研究,亦可看作是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路径。

至于“正史”中的礼志、乐志、历志、郊祀志(祭祀志)、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郡国志、州郡志、郡县志)、百官志(职官志、官氏志)、舆服志(车服志)、仪卫志、选举志、兵志等,反映了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丰富内容。《史记》八书、《汉书》十志开这方面的先河,其价值自不待言。其后,大部分正史中都有志的撰述,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化史资料,如《晋书》中的《刑法志》保存了先秦法家李悝《法经》的片段,

为后人研究李悝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食货志》从三国时代讲起,大体弥补了《三国志》在无志方面的缺憾。《律历志》所记几种历法,是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重要资料^[3]。《宋书》的《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时期的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4]。《魏书》的志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材料,如《食货志》记录了太和九年(485)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和租调制,是研究北魏和以后三百年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关于食货的记载,有助于对当时北魏境内各地社会经济的了解。《灵征志》的上卷留下北魏建立以来一百五十年间的各地地震记录;《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列举了拓跋部和所属部落、氏族姓氏和魏孝文帝所改汉姓,为后来姓氏基本材料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拓跋部族的形成和当时各族的部落、氏族的分并离合。《释老志》叙述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和寇谦之修改道教的经过^[5]。《辽史》的《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布以及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百官志》记录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等^[6],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正史中的志反映了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多方面面貌以及中国古代制度文明连续性的特点。

第二,中国史书尤其是历代正史中记载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其中有许多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通读正史中的一些类传,尤其是《儒林传》(《儒学传》)、《文学传》(《文苑传》、《文艺传》)、《方伎传》(《方术传》、《艺术传》)等,则可以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有关面貌,如范曄《后汉书·儒林传》写的是东汉时期经学家的传记,按《易》、《书》、《诗》、《礼》、《春秋》经传分类,各类依时间为序,一一为传。各类起始均上接《汉书》所载经生,记其源流;结末处则补叙本传以外经学大事,以备互见,以明终始,读来一目了然,可谓是一部简明有序的东汉经学史。在《后汉书·儒林传》传首,范曄作了长篇序论。一是写出了“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的文化政策及实际措施;写出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迹林蔽。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的盛况。到了汉明帝时,学子众多,“匈

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二是概述了东汉时期儒者之风的几度盛衰,直至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还“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在《后汉书·儒林传》传末,范曄又撰写了后论,指出早在桓帝、灵帝时,东汉朝纲已是一片衰败景象,随时都有“崩离”的可能;而“权强之臣”、“豪俊之夫”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正是光武“中年以后”、“专事经学”、“其风世笃”所致。这是《后汉书·儒林传》所要阐明的基本思想。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范曄的这篇史论说明了主导的意识形态、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于维系政治统治的重要性。而有的传记中保留下来的名篇往往是文化史上的珍贵文献,如《汉书·司马迁传》中的司马迁《报任安书》、《宋书·范曄传》中的范曄《狱中与诸甥侄书》、《梁书·范缜传》中的范缜《神灭论》等。

由上述两个方面可见,史学的确是文化发展、文化积累的主要载体,史学与文化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

二、史学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讨论文化建设,首先要认识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①。

这一段话,把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和伟大意义作了精辟的理论概括。根据这一理论概括,史学界在当代的文化进程中,应当而且能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从史学的功能和特点来看,这个积极作用的主要任务是:运用各种历史撰述形式,阐明中华文化连续性发展的特点以及记录这一文化连续性发展的历史撰述亦未曾中断的意义,这是中国史学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同时,史学工作者要努力提高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在有关国计民生、经济社会、国家安全等研究领域创造出新的成果,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国家的软实力作出新的贡献。笔者认为,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应首先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运用各种历史撰述形式,阐明历史上各民

族间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思想纽带。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个时代任务,也是史学工作大有可为的崇高使命。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费孝通提出的论点及其论证^[7]、白寿彝论述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8]以及杨向奎撰写的论著^[9],都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为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杨向奎有一段概括的论述,颇具启发性:

大一统的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凝聚力。这种力量的渊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内容丰富,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更占有重要地位。“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使我国人民具有自豪感与自信心,因而是无比的精神力量。它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这“华夏”与“中国”不能理解为大民族主义或者是一种强大的征服力量。它是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了的境界,这种境界具有发达的经济、理想的政治、崇高的文化水平,而没有种族歧视及阶级差别,是谓“大同”。当然这种境界是逐渐形成的,由大一统的政治统一过渡到社会性质的变迁^[9]。

国家统一,是历史传统,也是现实存在,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作出新的研究和论述,是对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第二,深入地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上朝代治乱兴亡的基本规律,为当今治国安邦提供借鉴。《隋书·经籍志》总序中有这样几句话:

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10]②。

这里说的“治国”、“治身”、“政化”,都是讲文化的社会功用。古今历史条件不同,社会内容不同,但文化

①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② 按“王、阮志、录”是指南朝宋人王俭撰目录书《七志》、梁人阮孝绪撰目录书《七录》。

和史学的社会功用却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当代的关于“治国”、“治身”、“政化”的要求,就应如同李大钊所说,不能只关注“零零碎碎的事实”、“片片段段的東西”,而要寻求历史存在的“普遍的理法”。他认为“史学的要义有三:(1)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进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发达进化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2)就实际发生的事情,一一寻求其证据,以明人事变化的真相,是历史研究的特色。(3)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必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東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感应。在这种研究中,有时也许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1]李大钊所说的“普遍的理法”即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认识规律应建立在“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成立”的基础上,故历史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满足于“零零碎碎”、“片片段段”的阶段。只有这样,史学在文化建设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运用各种通俗形式普及历史知识,以推动全民族综合素质的提高,这是历史教育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全民族的历史知识水平提高了,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有助于文化自觉意识的提高。近些年,各种媒体和出版物有许多是以普及历史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这是一个好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基本观点上,确有一些低俗、庸俗甚至错误的东西,以“娱乐”为宗旨、以“吸引”听众、观众为目的,宣扬宫廷秘事、政治权谋、翻案胡说、篡改历史、蔑视权威、传播个人的臆想与偏见等,举不胜举。这种不良现象非但无助于普及历史知识,而且对社会公众学习历史、认识历史会起到误导作用,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引起公众的不满和史学工作者的忧虑。此种现象在文化建设中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要不断克服这种不良倾向,使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循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什么是普及历史知识的健康之路呢?白寿彝先生曾以吴晗为例概括道:“历史知识,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增长智慧、培养历史感、时代感、民族自豪感,提高对祖国前途和人类前途的认识及信心的重要武器。

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是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这在吴晗同志思想上是明确的。用大家容易接受的形式去传播历史知识,这在吴晗同志的思想上也是明确的。实际上,这二者总是联系在一起,是很不容易分开的。传播历史知识的形式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当然,传播历史知识,首先要看观点是否正确,其次要看材料是否可靠,而表述的形式往往会直接影响它的效果,所以,形式问题也是应该重视的,或者说,也应该摆在重要的地位。”^[1]白寿彝先生还指出“我们从这个工作上,肯定吴晗同志的成就,是不是就是肯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了。我想,我们在这方面不断地宣传和努力,也是对他最大的怀念。”^[1]白寿彝先生这里所说的“吴晗同志的成就”主要是指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编、出版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史学工作者致力这一事业,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今,根本的问题是端正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和宗旨,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一定会比以前做得更好,在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三、在文化建设中进一步推进史学发展

文化的发展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史学也是如此。在深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形势下,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任务面前,文化建设对史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进一步推进史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氛围。历史研究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说明历史。一个多世纪的科学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史学坚持这一方向,必将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在史学领域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相互沟通、取长补短,开展健康、有益的史学批评,这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在这样一个总的原则下,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有必要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一)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

这项工作一方面是使中国现代史学具有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性质,另一方面是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因而具有双重的意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作为后继者,应当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在吸收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史学成果,以适应文化建设的要求。

从史学发展的观点来看,如果说刘知幾《史通》内篇中的《六家》、《二体》、《杂述》和外篇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可以视为他那个时代的中国史学史的话,则刘知幾所论,表明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不论他是否有自觉的认识,但却是有反映的。刘知幾讲到史学演变时说“爰及近古,斯道渐繁。史氏流别,殊途并骛”(《史通·杂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他说的“近古”不正是指魏晋南北朝而言,他所谓“斯道渐繁”、“殊途并骛”,正是说的“多途发展”吗。如此看来,刘知幾当时所面对的“近古”以来“斯道渐繁”、“殊途并骛”的史学,要对它作出评论,谈何容易!但是,刘知幾做到了,他的《史通》一书流传至今,仍是史学工作者不可不读之书。

那么,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是否也遇到了一个新的史学“多途发展”的形势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个“多途发展”的史学还应当上溯到近代。大家都知道,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不能不研究魏源、黄遵宪、梁廷枏、徐继畲、王韬等关于外国历史的撰述,因为这是中国史学自觉面向世界的开端。如果说我们现在撰写中国史学史著作,还能够比较详细地阐述魏源等的史学活动,还能够大致反映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何炳松、周谷城、齐思和等老一辈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研究之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研究的研究,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中的分量似有日益削弱的趋势。这种趋势表明,当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视野和撰述内容,已明显地滞后于当今中国史学“多途发展”的形势,这是当今中国史学史学科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

当然,中国史学史学科(或专业),其研究对象首先是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史学的研究,这毋庸置疑,但是中国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史学的研究,无疑也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内容,正如同国外的“中国学”本是国外学术的一部分。对此,中国史学

史研究者应当有自觉和明确的认识。概括来说,这一认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表述:对中国学者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研究的研究,自应包含在中国史学史的范围之内。如果这一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当今中国史学所面对的史学“多途发展”的形势就十分清晰了。

第一,从中国历史著作来看,按照通常的说法,有通史、断代史(或朝代史)、专史、专题考察、历史人物等,是几项大宗。其中,通史和断代史(或朝代史)的著作层出不穷,专史专题考察的著作种类繁多,历史人物评价和人物传记更是不计其数。近年来,我们强调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从类型上看,一般都在上述范围之内,但也各有特点,这方面的研究有不少困难,而目前所做的仅仅是开始。最近二三十年来,有关社会史和区域史的著作不绝于时,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新气象。它如史学遗产中的方志、野史、笔记、家乘等,在中国史学史的撰述中亦应占有相应的位置。对此,尚须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中国史学史上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领域,是由“史”的研究向“论”的研究的提升。当然,“史”与“论”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但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加强“论”的研究是继续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最近,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笔者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书,史学界的师友们给予了很多鼓励。但笔者深知,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开始,需要发掘、梳理、阐述的问题还很多。此外,西方的进化论怎样影响到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从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面貌,都有必要从理论上作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关于史学理论,笔者在20年前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只是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后来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中华书局1994年版),也只是就一些关于史学理论的范畴和问题作了概括的论述。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来受到同仁的关注,希望不久能有佳作问世。再说历史文献学问题,白寿彝先生在30年前提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可以包含四个部分:(1)理论的部分;(2)历史的部分;(3)分类学的部分;(4)应用的部分。”^[10]他对此还作了一些阐说。这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但怎样把这一提示展开,写成一部

系统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著作,也是需要下一番功夫才能做到的。总之,各方面的理论问题研究深入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第三,关于中国学者的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研究的研究。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史学史学科不可缺少的内容。由于笔者在这个领域素无研究,所以下面所说的一些看法,尽管只是一些原则上的议论,但也可能存在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地方,若如此,希望同行们予以指正。中国学者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在历史方面,如按传统的说法,有“世界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的划分,有地区史和国别史的设置,有各种专史、专题研究和历史人物评价与历史人物传记,国际关系和相关领域的比较研究也颇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关于“现代化”问题、“全球史”问题和“生态环境史”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的“热点”等。在史学史方面,不断有“西方史学史”专著或教材的面世,有兰克史学的研究、鲁滨逊《新史学》的研究、“年鉴学派”的研究、社会史学派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等。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论著面世。上述研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何炳松、周谷城、齐思和等老一辈史学家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以来毕业的史学博士,几代人的连续耕耘,可谓是硕果累累。新近面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张广智教授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学者的这一西方史学史著述成就,或许也会使西方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者感到惊讶。因此,关于中国学者的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之研究的种种研究,都是中国史学史学科所应当关注的对象,都应当纳入中国史学史的范围。

(二) 进一步建设优秀的传统史学的传承体系,加强对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的总结、继承和利用,为当今中国史学发展提供思想资料

这方面的任务十分艰巨,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亟待研究,如历史上的史学家怎样看待历史发展过程、怎样看待史学和社会的关系、怎样看待历史经验教训、史学工作者怎样提高自身的修养等,都是关系到史学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进行系统的和贯通的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题研究已有所开展,并

取得可观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笔者说的专题研究,是要更加着眼于通识,即以通识的眼光对某一专题作贯通的考察和论述。这里,我们不妨以白寿彝先生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作为说明这种专题研究的重要性。1984年,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提出:

近两年,国内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是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这件工作牵涉的方面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下点功夫及早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

我说的这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像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兴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也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范围。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12]。

这“两个重要问题”的提出,受到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多次被引用和阐说。但是,作为有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尚属罕见。白寿彝先生把这“两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同学科建设联系起来,按笔者的理解,一是强调史学史研究要把历史上的史学家怎样认识历史进程作为重大问题对待,二是史学史研究要说明历史上的史学家怎样看待自身工作的社会意义,从而阐明史学工作的重要价值,前者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后者有助于人们认识史学。人们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认识清楚了,学科的合理性也就进一步确立起来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自然应当受到重视。

几年前,笔者倡导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并举办了以此为题的全国性研讨会,受到许多同行的支持,尤其得到民族史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表明民族史学研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专

题。不论是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典籍,还是汉文文献中涉及少数民族史学活动与思想的记载,都是这个专题研究所应当关注的。因此,这个专题研究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有系统的分支专题研究。这一研究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容,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很突出。

历代“正史”中的书志,有的也可以作为专题进行系统研究,如把《食货志》、《地理志》贯穿起来研究,参以有关专著,或许可以从史学史的视角梳理出中国史学家的经济思想和地理思想。“正史”中的类传也是如此,有些类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行事的准则和社会风尚,作贯通的研究可以窥见不同历史时期世风的变化,既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加深了人们对史学的理解。

唐宋以下,历代史料笔记(包括考辨笔记)也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刘叶秋的《历代笔记概述》一书已为这一研究开辟了先河。在此基础上,从史学发展的视野,对此作全面的、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尚有很大空间。与此相关的是,这些史料笔记还包含了一些作者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述,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家视野的开阔和见闻的丰富,对于研究中外文化史、交通史,这都是重要的参考。在历代史料笔记的研究中,这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进行系统的考察。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专题,并可以列为专题作系统的和贯通的研究,当然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可供开拓的领域是极为广阔的。我们可以预期,这些专题研究的展开,必将把中国史学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 加强史学工作者的队伍建设

这是涉及史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优秀史学人才的培养和合理的梯队结构,是队伍建设中两个相辅相成的环节。笔者曾经作这样的憧憬和期待:“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这些新型的史学家,应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的根底,应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识发展,应具有较高的古代汉语的修养、现代汉语的表述水平和外语水平,应善于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我们应当

有一种探索造就新型的史学人才模式的自觉意识。”^[13]今天看来,这种憧憬和期待并未过时,而且显得更加突出了。至于学术梯队的建设,一方面涉及学术传承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与培养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派有密切关系。学派的存在,不是鼓励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是激励不同学术风格的张扬与不同学术观点的切磋,以促进学术的发展。这两个方面抓好了,史学队伍建设才能趋于合理,史学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保证,中国史学也就有希望、有更辉煌的未来。

四、结 语

史学与文化的辩证关系,使它们在历史运动中相互促进:史学在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也在文化建设中进一步提升自己,为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李守常. 史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2] 白寿彝. 史记新论[M]. 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 [3]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 脱脱. 辽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8] 白寿彝. 中国通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9] 杨向奎.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
- [10] 魏徵.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1] 白寿彝. 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怀念吴晗同志[C]//王宏志,闻立树. 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11-315.
- [12] 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13] 瞿林东. 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和21世纪的前景(论纲)[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5):37-45.

(下转第16页)

National spiritual home: its historical retrospect and current reconstruction

LIU Xue-zh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Xi'an 710062 , Shaanxi ,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spiritual home is the repose and homeland for the soul. Constructing process of Chinese national spiritual home was reviewed in this paper. It is believed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ual home originated from Yin and Zhou Dynasties , its first reconstruction was in Han Dynasty , the second was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the third was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Currently , the fourth reconstruction is under way and this reconstruction can't break away from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 Buddhism and Taoism , and can't ignore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ulture on Chinese society , especially on Chinese ideology and outlook.

Key words: spiritual home;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western culture

.....
(上接第 7 页)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QU Lin-dong

(School of History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culture is dialectical: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connotation, history is a part of culture; in terms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its reflected outlook, culture is included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History plays a unique positive role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t can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ntinuous cultural development, reveal the fine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different nations in history,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ise and fall, order and disorder, and spread historical knowledge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quality.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can enhance Chinese history to a higher level, and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progress of Marxism history and establishment of inheritance system and the growth and expanding of historians, so as to usher in the new height and realm of Chinese histo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histo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dialectical relation; historian